

朱德发

五四文学初探

山东人民出版社

五四文学初探

朱 德 发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济南

五四文学初探

朱 德 发

•

山 东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 东 省 书 报 出 版 发 行 山 东 人 民 印 刷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9.75印张 205千字
1982年7月第1版 198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书号 10099·1578 定价 0.67元

内 容 说 明

本书所论述的大都是五四文学革命有争议的，或被湮没的历史问题。它基本上能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从丰富的史料出发，对一些问题作了深入地探讨。既不是简单地套上一些公式和原理去分析复杂的文学现象，又不是无视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实际贡献而去裁判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而是从大量的事实中形成观点，作出比较切合历史本来面目的结论。不论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或者对某些倡导者的文学理论主张以及在当时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品，都作了比较具体、深刻的分析和符合实际的评价，并对某些有分歧的重大问题，提出了有根有据的独到见解。不仅对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或者教学者，颇有参考价值，而且对爱好新文学的广大读者，亦会大受启发。况且，作者论事述史，思路开阔，逻辑严密，气势充沛，文笔流畅，更令人受益非浅。

责任编辑： 赵耀堂

目 录

试探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	(1)
鲁迅五四前后“为人生”的文学观·····	(48)
茅盾五四时期新文学观试评·····	(91)
评五四时期胡适的白话文学主张 ·····	(126)
论五四时期周作人的文学主张 ·····	(193)
冰心早期“问题小说”思想意义新探 ·····	(221)
评胡适的《尝试集》及其诗论 ·····	(258)
论《狂人日记》的人道主义思想倾向·····	(280)
后记·····	(302)

试探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

五四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演进的过程中，是一场继往开来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革命。对于这场新文学运动的指导思想，数十年来众说不一，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学或研究带来一些不容回避的、必须以正确的观点和可靠的史实予以回答的问题。

邓颖超同志在一九七九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五四时期老同志座谈会”上的发言，对我们进一步探究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指明了方向。她说，理论战线的问题就是要抓住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根本，而“抓根本就是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要讲实事求是。拿五四运动来说，我看了一些材料，里面说五四运动是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受马列主义的影响。说受十月革命的影响，这符合事实，可以；但说受马列主义的影响，就不完全符合事实。我们许多人参加五四运动时知道十月革命，但还不懂得马列主义。今天看到一份材料，介绍台湾有人否认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组织上作了准备的这一事实。我认为，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我们党的成立作了准备的。”〔1〕这里既指出一些人对五四运动的性质或指导思想的不切实的过高估价，又批判了“台湾有人”对五四运动的深远革命意义的歪曲诋毁，并为我们坚持辩证唯物史观、实事

求是地评价五四运动作出了榜样。尽管邓颖超同志是从政治革命的角度总论五四运动，但因五四文学革命是其一翼，所以于我们探讨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也颇有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探讨任何社会问题，应当而且必须从实际出发，即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与事实的联系中去把握事实，只有在这种意义上，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最确凿最富有说服力的证据；如果只是片面地或者随意地宰割事实为某种“公式”或“信条”服务，那么这事实不仅是种儿戏，而且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正如恩格斯给“保尔·爱因斯特的信”所指出：“不把唯物主义的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导线索，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将历史的事实宰割和剪裁得适合于它，那末唯物主义的方法就变成和它相反的东西了。”〔2〕正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我们试对五四文学革命所提供的客观史实的全部总和作了初步考察，并从史实的联系中作了初步分析，因此深感如下的论断是值得商榷的：

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是一九一八年。从这一年起，文学革命的领导力量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3〕

上述主要提出两个互相联系的问题：一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一是五四文学的指导思想。对于这两个问题，我的基本观点是：

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直接关系到五四文学革命的起止问题，弄清它有助于正确理解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因为任何社会问题的研究和考察，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范畴。对于五四文学起止虽然说法不一，但是我同意这样的看法：五

四文学革命并非从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这一天开始，而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即从一九一七年初胡适、陈独秀正式提倡文学革命起，到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茅盾的说法大体上是符合史实的：“‘五四’这个时期并不能以北京学生火烧赵家楼那一天的‘五四’算起，也不能把它延长到‘五卅’运动发生时为止。这应从火烧赵家楼的前二年或三年算起，到后二年或三年止。总共是五六年的时间。火烧赵家楼只能作为运动发展到实际政治问题，取了直接行动的斗争态度，然而也从此由顶点而趋于下降了。这样去理解‘五四’，方能够把握‘五四’的真正的历史意义。”〔4〕他虽然是从政治运动来考察“五四”的历史范畴，但对于我们正确理解五四文学革命的起止日期却紧密相关，因为文学革命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受着政治运动的制约，特别五四新文学同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反帝爱国斗争的联系更为密切。既然五四政治运动有一个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那么五四文学革命当然也有个发展阶段，“突变”（指“五四”这天）的观点很难令人接受，以一九一八年作为文学革命的起点的说法也是违背史实的。诚然鲁迅的《狂人日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是从白话文学创作方面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这是鲁迅听文学革命前驱者的“将令”而写的，但它并非新文学运动开始的标志，科学地说它是文学革命发展中在创作上的里程碑，是文学革命取得辉煌成就的标志。至于说《狂人日记》体现了无产阶级思想对新文学的领导，后面再提出异议。

由于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范畴直接关涉到对其指导思想的把握，因此上述仅仅从这一意义上对五四文学的起止时间

作了粗略的说明；之所以这样划定的根据，也许在对五四文学指导思想的探究中能进一步阐述。正是从这一历史范畴着眼，我们初步分析了一些史实，认为“五四文学革命从一九一八年起由马克思主义思想来领导”的说法，并未建立在可靠的具有雄辩力的史料基础上，所以很难令人诚服。

本着学术问题应贯彻“百家争鸣”的精神，作为一个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学步的幼稚者，我冒昧地提出以下的粗浅（或错误）看法，以就教于各位老前辈和同志们：

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呈现出一种比较复杂的形态，它是各种“新思潮”的混合体，但在构成这一复杂形态的带着各自不同色彩的新思潮的诸方面中，民主主义与之相联系的人道主义思想是主要方面，因之也占有主导地位；

十月革命对发展中的五四文学革命的确发生过影响，社会主义思想因素不论在文学革命主张或新文学创作中都存在着一定的“量”，尽管它在五四时期并未对新文学起到实际上的主导作用，但五四以后随着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日益结合，无产阶级思想才真正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学的主导思想，并且强有力地指引着由五四时期开创的新文学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其主要根据如下：

发生在中外古今文学史上的任何性质的文学革命，大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这里仅就五四文学革命产生的特定的

国际历史背景及主要思潮加以探讨，以作为判定其指导思想性质的不可忽略的依据之一。

对于五四文学革命产生的国际政治背景，李大钊在一九一九年元旦写的《新纪元》里作了比较确切地论述：

一九一四年以来世界大战的血、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血、一九一八年德奥革命的血，好比作一场大洪水——诺阿以后最大的洪水——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来。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和一九一四年以前的生活、文明、世界，大不相同，仿佛隔几世纪一样。

看呵，从前讲天演进化的，都说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你们应该牺牲弱者的生存幸福，造成你们优胜的地位，你们应该当强者去食人，不要当弱者，当人家的肉。从今后都晓得这话大错，知道生物的进化，不是靠着竞争，乃是靠着互助。人类若是想求生存，想享幸福，应该互助友爱，不该仗着强力互相残杀。从前研究解决人口问题的，都是说马尔查士说过，人口的增加是几何的，食物的增加是算术的，……种种不公平背人道的东西，都起于这个学说。……从今以后，人心渐渐觉醒。欧洲几个先觉，在那里大声疾呼，要求人民的平和，不要皇帝，不要常备兵，不要秘密外交，要民族自决，要欧洲联邦，做世界联邦的基础。这都是差强人意的消息。这些消息，都是这新纪元的曙光。在这曙光中，多少个性的屈枉、人生的悲惨、人类的罪恶，都可望象春冰遇着烈日一般，消灭渐净。多少历史上遗留的偶象，如那皇帝、军阀、贵族、资本主义、军国主义，

也都象枯叶经了秋风一样，飞落在地。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5〕。

这便明确地揭示出人类新纪元的突出特征：一是新纪元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开始，以“俄国革命”为真正的焦点；而“新纪元”的到来并不是自然进化的，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无产阶级革命的血和民主主义革命的血换来的，开辟了一个人类反侵略、反强权、反压迫，争取自由平等、和平友好，创造新生活的新时代，这是一个“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的新时代，而“总罢工，就是他们的武器”。二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世界革命斗争实践的检验，社会达尔文主义、马尔萨斯人口论都是为军国主义张目的强盗逻辑，对人类的自由平等、和平幸福生活的欲求毫无益处；世人真正从血的洗礼中认识到“互助友爱”精神则是人类“求生存”和“享幸福”的思想宝筏，这在一定程度暗示出无政府主义的“互助”论在“新纪元”中还有着广泛的影响。三是新世纪的曙光据当时李大钊的解释，不仅含有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光辉，而且主要是指“欧洲几个先觉”者所大声疾呼的“公理战胜强权”的民主主义精神。正如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中所说的：“自从德国打了败仗，‘公理战胜强权’，这句话几乎成了人的口头禅。列位要晓得什么是公理，什么是强权呢？简单说起来，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依仗自家强力，侵

害他人平等自由的，就是强权。”正是在这种“人道的警钟”的振动下和“自由的曙光”的照耀下，“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四是中国当时处在“国势陵夷，道衰学弊”〔6〕的黑暗沉寂时期，并没有出现俄国那种由布尔什维主义领导的革命，也没有发生象匈奥、德国、勃牙利、荷兰、瑞典、西班牙那种由“革命社会党”奋起领导的革命；尽管如此，但也“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得到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这不仅说明了新世纪的曙光照进黑暗中国的深远意义，而且也非常有分寸地指出新世纪的曙光尚未普照中国大地，中国人民还没有真正觉醒。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上，在新世纪一线曙光照耀下，随着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序幕的拉开，古老中国的封建主义黑暗王国的上空，由远而近、由隐而显地传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春雷。

如果说，这“新世纪的曙光”正象有人所解释的那样，完全指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曙光，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曙光，而且普照全国各个领域；那么，也许说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就会令人确信无疑了。但是历史事实胜于雄辩，它可以否定不完全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主观推断：新世纪的曙光对中国五四时期所照射的范围开始并不大，而是逐步扩展开来；同时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感光强弱也大不一样；更重要的是，新世纪曙光中的社会主义思想光辉对五四时期中国的映射力量远不如“平民主义”思潮。对此，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已反复强调过。李大钊不止一次地说，那时风靡世界的“绝大的潮流”是“平民主义”即民主主义；而这种平民主义“崛起于欧洲，流被于美洲，近

更借机关炮、轮船、新闻、电报的力量，挟着雷霆万钧的声势，震醒了数千年间沉沉睡梦于专制的深渊里的亚洲。他在现在的世界中，是时代的精神，是唯一的权威者，和中世纪罗马教在那时的欧洲一样”；“无论是帝王，是教主，是贵族，是军阀，是地主，是资本家，只要阻碍了他的进路，他必把他们一扫而空之。无论是文学，是戏曲，是诗歌，是标语，若不导以平民主义的旗帜，他们决不能被传播于现在的社会，决不能得群众的讴歌。我们天天眼所见的，都是‘平民主义’战胜的旗，耳所闻的，都是‘平民主义’奏凯的歌，顺他的兴，逆他的亡。一切前进的精神，都自己想象着是向‘平民主义’移动着”，即使“自劳农俄国成立后”的“工人政治”（指苏维埃专政），亦是“本于‘平民主义’的精神而体现出来的”。李大钊所说的平民主义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虽然他将苏维埃的“工人政治”的来源归于平民主义，这只能说 he 看到平民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一定联系，但他并没有指出二者的本质区别。所谓平民主义，是指“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使人民全体，都是为社会国家作有益的工作的人，不须用政治机关以统治人身，政治机关只是为全体人民属于全体人民而由全体人民执行的事务管理的工具。凡是具有个性的，不论他是一个团体，是一个地域，是一个民族，是一个个人，都有他的自由的领域，不受外来的侵犯与干涉，其间全没有统治与服属的关系，只有自由联合的关系。这样的社会，才是平民的社会；在这样的平民的社会里，才有自由平等的个人。”这种“纯正的‘平民主义’”虽然含有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合理因素，但它带有浓厚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实质上是李大钊

对被“资本主义的时代用烂了，已为卑鄙的使用玷污了”〔7〕的平民主义所作的新解说，本质上仍然属于民主主义思想范畴。这种平民主义，不仅是世界的“绝大潮流”，而且也是五四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主潮，不仅是人类新纪元的时代精神，而且也是中国五四时期的时代精神，科学与民主便是这种精神的集中体现。正由于平民主义是压倒一切的强大思潮和“唯一的权威”，所以毛泽东同志当时明确指出：“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德莫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8〕可见，平民主义这种“浩浩荡荡的新思潮”随着五四运动的发展已波及到各个领域，成为当时纷纭复杂的新思潮中的一种起主导作用的新意识形态。五四文学革命虽然受到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但其具体指导思想势必是民主主义的。

这里还必须指出，当我们肯定平民主义思想在五四时期的“权威”和地位的同时，实际上对十月革命的影响也作了相应的肯定，为了把“影响”说得更明确些，应该充分估计到这种“影响”的革命意义：一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于一九一八年初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说：“中国革命党对于贵国革命党员之艰苦卓绝的奋斗，表示极大的敬意；而且更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9〕从孙中山对列宁及其布尔什维主义党的“敬意”和“希望”中，透露出十月革命对他的积极影响，并唤起他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新希望；二是“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

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0〕}李大钊等先进人物最早接受了十月革命的影响，尽管他们对“俄国人的路”的本质意义的认识上带有明显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局限，但对中国革命要“走俄国人的路”是深信不移的，是倾向社会主义的；真正能以无产阶级宇宙观作为观察中国社会问题的工具，并对“俄国人的路”具有深刻的本质的认识，是蔡和森一九二〇年八、九月份写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毛泽东同志的两封信》。可见十月革命对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这是不容否认的史实。

但是也必须承认，在五四文学革命中，不论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或者是新文学的倡导者，都没有明确地提出我国的新文学应象政治革命那样“走俄国人的路”。一九一九年茅盾写过一篇《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的长文，着重论述了十九世纪末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影响以及托尔斯泰在俄国文学界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并未涉及到我国新文学同俄罗斯文学的关系问题，即使影射到了，那托氏的创作倾向也体现不出十月革命后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方向。一九二〇年三月瞿秋白写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它考察了“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中国却已似极一时之盛”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大家要追溯他的远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于俄国，都集于俄国的文学；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

里，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这虽然极为深刻地揭示出布尔什维克赤色革命同俄罗斯文学之间的关系以及我国研究俄罗斯文学的政治原因，显示出十月革命在中国文学界产生的一定影响；但它并没有指出或暗示出中国创造新文学应以十月革命后苏联无产阶级文学为师。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周作人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及协和医学校作了题为《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的讲演，他强调五四新文学应学习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果戈里等的为人生的文学，并相信中国将来的新文学也是为人生的文学，但他却丝毫没有提及中国新文学应向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学习。即使一九二〇年十月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2号上转载的高尔基的《文学与现在的俄罗斯》，只说明在十月革命影响下有些人对苏维埃文学发展状况有所关注；郑振铎为此写的小序不仅未表明中国五四新文学应向苏俄十月革命后的文学学习，也没有提到五四文学应以布尔什维克主义为指导思想，可贵的是他看到了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建立为新文学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什么在十月革命影响下，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比较明确地意识到中国在政治革命方面应“走俄国人的路”而在文学上只是强调向俄罗斯文学学习呢？这里的原因较复杂，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无产阶级文学虽已产生，如高尔基的《母亲》、绥拉菲莫维奇的《沙漠中的荒城》、别德内依的诗歌等，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比起现实主义文学大师托尔斯泰、契诃夫等的这时期的作品在世界文坛的影响来，恐

怕少得多；十月革命最初几年，苏联文艺界出现了“未来派”、“象征派”和“无产阶级文化派”等资产阶级文学派别，其中危害最大的是“无产阶级文化派”，虽然这时期有一批社会主义文学陆续问世并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果，俄共（布）《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也于一九二五年发表，但对世界文学的影响并不大。鉴于苏俄社会主义文学处在初创期和文艺界的混乱，所以并未引起我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新文学倡导者的十分关注和重视，反倒认为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优秀传统，正是五四文学革命急需借鉴的，因为它更切合五四时期反对封建旧文学、创造具有民主精神新文学的需要。

二

“五四运动没有组织”，即“没有有主义的政党领袖”^{〔11〕}来领导；许德珩讲得更明确：“五四运动是自发的运动，没有党的领导，没有马列主义。”^{〔12〕}这虽然是指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政治运动而论，但对于考察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组织领导和指导思想也具有深刻的启示，尽管有的提法并不严密，却基本符合史实。诚然五四运动缺乏一个“有主义的政党领袖”来统一领导，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成为指导思想，但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演讲过程来看，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却是思想解放运动和文学革命倡导并发动的主要阵地，围绕《新青年》所形成的新文学阵线实际上对新文学运动起了领导作用，《新青年》所宣传的主旨实际上成了新文学的指导思想。因此，具体剖析《新青年》的